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 130 期 (总第 380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12 年 6 月 15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8961988622

编者按：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经济下滑明显，对此，上上下下严阵以待。在中央领导层频繁开展调研活动之外，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以及中央国家有关部门的调研活动更趋密集，调研主题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值得关注的是，湖南省成为本轮密集调研的重点区域。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以及中央部委多支调研队伍均在近期奔赴湖南，开展专题调研，有的调研时间更长达一周。

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看来，中央各部委密集开展调研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为了迎接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中央布置了很多调研题目，现在各有关部门正就相关题目在全国各地开展调研；其二，近期有关“稳增长”的调研活动频繁与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密切相关。中央各部委需要实地调研的结果作为调整宏观政策的依据。

本刊特此推出《稳增长》专题，供各位领导参考。其他栏目推荐的文章相信也会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要目

●本期专题/稳增长

中央十八大前密集调研 “稳增长” 调研近期频繁

“稳增长” 最该“稳” 什么

重视稳增长 探索走新路

倪金节：松绑地产或难实现“稳增长”

对降息拉动经济的三个预测

潘石屹、郭广昌“斗地主”

●政坛经纬

政府是有限的

司局级干部的“世界观”

●国是论衡/论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

●悦读时光/习仲勋逝世十周年 是如何直言反“左”的

●本期专题/稳增长

中央十八大前密集调研 “稳增长” 调研近期频繁

“稳增长”调研近期频繁

5月18日至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武汉调研并主持召开河北、辽宁、江苏、湖北、广东、陕西六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温家宝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此后，中央各部委围绕“稳增长”进行了多省份的调研活动。

6月7日至8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在山东、河北调研铁路建设工作。马凯深入山东、河北铁路施工现场，实地了解铁路建设情况，并在石家庄市召开部分地区铁路建设工作座谈会。

马凯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和调结构有效结合起来，加大对铁路建设的支持力度，保持必要的铁路投资建设规模，提高铁路运输能力和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商务部领导也分别率队前往山东、广东等出口大省调研外贸发展形势。

6月9日至10日，由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高虎城率领的中央对外贸形势调研组分别在东莞和深圳调研。调研组分别在东莞、深圳与当地政府召开工作座谈会，并赴一线企业进行现场调研并召开现场座谈会。

高虎城充分肯定了广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做的努力，并鼓励广东作为全国贸易第一大省，应继续发挥优势，克服困难，在我国外经贸“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中做出应有贡献。

同一天，即6月9日，商务部部长助理李荣灿一行来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调研对外贸

易情况。李荣灿对青岛市新华锦集团、三链锁业由单纯制造企业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两端延伸的做法表示肯定。他希望崂山区要立足于保增长、调结构，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楼宇总部经济，培育品牌企业，着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此外，5月31日至6月2日，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王化江副司长带队赴大连市开展经济形势调研。

湖南成调研重点引关注

5月25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吉首市、花垣县就推进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进行调研。

值得关注的是，在温家宝总理调研湖南前后，湖南省成为多家中央国家机关调研组重点关注的省份。

6月5日至10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刚带领的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赴湖南长沙、张家界、常德和株洲等地，就认真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进行调研。

王刚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增速保持在年初预期目标区间内，但国内外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艰巨性进一步凸显，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我们既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更要坚定信心，看到各种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

除此次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的调研活动外，自4月份以来，全国政协先后3次在湖南展开调研。4月9日至13日，由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许仲林带队的全国政协调研组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法治建设”专题在湖南调研。5月10日至14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汪啸风、张黎带领全国政协调研组就“全国农村土地可持续利用”专题在湖南调研。5月20日至27日，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俊九带队就“中央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关问题”在湖南、安徽两省进行调研。

在5月底6月初，全国人大调研组也集中造访湖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乾元、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启智分别就保护和治理好湘江、《森林法》修改问题、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情况在湖南展开调研。马启智率领的全国人大民委调研组在湖南的调研时间长达一周。

中央部委多位领导也在湖南开展调研活动。5月12日至19日，在温家宝总理调研湖南前夕，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率领卫生部、住建部、人民银行、国家林业局、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和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同志组成的国务院第六督查组，专项督查湖南省连片特困

地区扶贫开发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

湖南省委书记周强表示，湖南近年来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先进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文化旅游等产业快速成长，新的竞争优势正在形成，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汪玉凯认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中央部委集中调研湖南与近年来湖南力推“四化两型”建设取得的成绩密不可分。“前不久，湖南省在北京召开了‘两型社会’建设中期评估会，与会专家对湖南的‘两型社会’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汪玉凯说。（2012-06-11 东方早报）

“稳增长”最该“稳”什么

5月18日至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武汉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并主持召开冀、辽、苏、鄂、粤、陕六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温家宝指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5月20日新华网）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一信息被敏锐的媒体捕捉到，新华社并进行了解读。从国际看，发达经济体处于低增长态势，影响我国对外出口；而国内经济增速连续5个季度放缓，再加上企业用电量、铁路货运周转量增速持续回落，财政收入增幅下降，所以要以稳增长来防止经济下滑。

如果经济不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增长，或出现不好的苗头，显然，不仅会影响到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公共福利，而且还会影响到公民就业、收入等。尽管今年有意放缓经济增速以调结构，但主动放缓经济增速与各种复杂因素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完全是两回事。因此，应理性看待“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事实上，“稳增长”本来就是今年的首要经济任务。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今年的政策顺序：“稳增长、防通胀、调结构”。现在，无论是各项数据显示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还是民间声音认为今年经济形势严峻程度超过了金融危机的2008年，都说明要高度重视稳增长。

显然，今年的稳增长与往年有所不同，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要调整经济结构，还要控制通胀预期，调控的艺术很难把握，实现预期目标有不少挑战。而要想拿捏好调控分寸，处理好经济增速、结构调整、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关键是要清楚经济调控的“核”是什么，抓手是什么。

早就有学者断言，经济增速一旦明显放缓，楼市调控必然放松。这种判断在一些地方已应验，如以各种手段变相放松楼市调控，奖励购房人、补助公务员购房、提高公积金支持力度、放松土地政策等。但是，稳增长不能指望房地产。

在过去的经济增长放缓期间，不少地方为拉动经济增长采取了各种极端的救市措施，如乱上投资项目、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对某些污染项目放行等。然经济一旦恢复正常，各种问题就会不断暴露出来。那么，今年的“稳增长”最该“稳”什么呢？

显然，“稳民心”才是“稳增长”的核心和抓手。解决好了“稳民心”，稳增长、防通胀、调结构等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尽管经济增长放缓有外因，但在我们无法左右外部形势的情况下，必须要从自身入手。如果能实现“稳民心”，就能实现扩内需，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所谓“稳民心”，实质就是改善民生让民心稳定，不忧虑、不躁动，即让民众放心消费、愿意消费。但前提是，要提供健康的消费环境，要以健全的社会保障消除后顾之忧，要增加民众收入让大家有钱去消费。很多国家和国际商业巨头都看中了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我们显然更要意识到国内消费市场潜力无限。

做到“稳民心”，自然也能防通胀。若民心不稳，资金流动失序，就会助推通胀。民心稳定了，敢于消费了，就不用释放过多流动性了。我们的经济增长长期主要依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来拉动，这显然是难以持续的，必须让消费拉动经济。从这个角度而言，“稳民心”还有利于调结构，不再依赖出口和投资。（新华网 冯海宁）

重视稳增长 探索走新路

记者：虽然风险可控，但毕竟经济数据在不断走低，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去观察和分析这种态势？您认为应不应该推出一定规模的刺激政策？

王一鸣：当前经济增速回落有多重因素，既有外部需求收缩与内需增长放缓的相互叠加，也有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因素的相互交织，还有短期需求波动和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相互作用，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不同于以往经济下行主要是受经济周期性调整和短期需求收缩的影响，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已隐含着结构性因素和潜在增长率变化的作用。如果从更长的时间段来观察，事实上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就开始放缓。2008年第四季度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季度增长率回落幅度进一步增大，到2009年一季度经济增速达到本轮周期的最低点，增长率仅为6.6%，以后随着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季度增长率强劲反弹，但依靠外部刺激而非内生

动力拉动的增速反弹是不可持续的。进入 2010 年，季度增长率从第一季度的 11.9% 放缓至第二季度的 10.6%、第三季度的 9.6%，第四季度轻微反弹至 9.8%。2011 年季度增长率逐季下滑，四个季度增速分别为 9.7%、9.5%、9.1% 和 8.9%，今年一季度再回落到 8.1%，连续 5 个季度增速回落。从这个视角观察，经济增速放缓既受到短期因素影响，也有中长期因素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短期刺激政策，不可能解决结构性矛盾和潜在增长率下降问题，如果过度加大政策力度把经济增速拉起来，通货膨胀、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矛盾就会进一步加剧。

当前形势下，不宜出台大力度的刺激政策，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根据形势变化加大预调微调力度，既要避免政策力度过大，在潜在供给能力下降的条件下通过外部刺激把经济增速拉起来，增大通胀压力，并使经济重归粗放型增长轨道；也要适当加大政策力度，防止经济增速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惯性下滑，从而使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为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创造条件。

记者：稳增长要靠内需，而增加投资是我们最轻车熟路的调控手段，人们猜测会不会再次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

王一鸣：1998 年和 2008 年应对危机时，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扩大投资，扩大支出，有效应对了危机的挑战。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未变，但内容和力度上已有所调整，“增支”上有所控制，“减收”上在加大力度。“减收”主要是实施结构性减税，包括落实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的各项政策，实施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扩大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降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实施减轻物流企业税收负担的相关政策，等等。只要继续落实好结构性减税政策，真正减轻企业税负，对实体经济应该有很好的支撑作用。

说到投资，在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稳定投资增长仍然是稳增长的重要条件。虽然人们担心，扩大投资会加剧投资与消费的失衡，使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提高，但也要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仍然较低，扩大投资依然有较大空间。在合理调整优化投资结构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公共投资支出不仅有必要也有条件。因此，应认真梳理在建续建项目，优先保障重大在建续建项目的资金需求，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与此同时，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适时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特别是铁路、城市公交、节能环保、水利、研发平台、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重点项目。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的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仍然较低，扩大投资依然有较大空间，但

在目前国内存在着产能过剩，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是否适宜再上新项目？

王一鸣：在目前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新上项目应主要是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领域的项目，这样不会加剧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当然，这些项目也要放宽准入，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当前，一方面存在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又存在融资困难，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表明投融资渠道仍然不畅。即便在一些看似盈利空间不大的项目，应该也能找到合理的商业盈利模式，吸引民间资本投资。

稳增长不能走老路

城镇化是我国最具潜力的内需所在

记者：调控要处理好增长、结构、物价三者关系，目前应怎样理解和处理稳增长与调结构及控物价的关系？我们能不能在增速下滑的情况下坚持结构调整？如果迫于就业等压力出台刺激经济增长政策，会不会形成新一轮物价、房价上涨的局面？

王一鸣：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和控物价的关系，一直是宏观调控的一条主线。稳增长，是增加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政府公共服务、推动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调结构，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先决条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控物价，是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重要前提，也是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重要举措。处理好三者关系，就是要在宏观政策上把握好三者的平衡，找到合理的平衡点。

当前，稳增长的矛盾更加突出，要把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避免惯性下滑。如果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各方面的压力就会很大。但是，稳增长不能完全走老路。在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要有适当的手段和措施来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但我们更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和开辟稳增长的新路。今后一个时期，培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推进城镇化，特别是要以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推进深度城镇化。城镇化是我国最具潜力的内需所在。我国目前近 7 亿城镇人口中还有 2 亿左右农村转移人口尚未转化为城镇居民，按照今后 20 年城镇化率达到 70% 计算，还将有 3 亿左右人口要由农村转入城镇，将这部分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过程，是一个不断释放出新的需求的过程，由此形成的内需潜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低估。

当然，稳增长也要处理好与调结构的关系，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避免落后产能死灰复燃，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增强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如果过度追求增长速度，总需求和总供给失衡，就会增大物价上涨压力，结构调整

目标也很难落到实处。(6-11 人民网朱剑红)

倪金节：松绑地产或难实现“稳增长”

目前，GDP 增速固然在滑落，但依然维持在远高于 7.5% 的位置。财政收入、货币扩张也在回归正常化增长。只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下去，化解掉**房地产泡沫**、实现房价合理回归完全可期。

由于 5 月份发布的经济数据继续走低，“稳增长”的政策正在不断推出。继发改委快速启动投资项目审批、货币政策明显呈现放松趋势之后，房地产政策松绑，可能将成为救市的又一张王牌。

据《投资者报》报道，近日，发改委内部人士透露，调控房地产引发的经济真空比预想的情况要严重，如果现行的政策刺激不能止住经济放缓，未来不排除给地产项目“开口子”。

相较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产业升级，实现增长质量的显著提升而言，继续过往的以房地产为支柱的“老办法”，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当然更为立竿见影。

所谓的老办法，指的是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只是，这一模式给未来的中国埋下了不少的“炸弹”。老的发展模式是以货币超发为前提的，但现在愈发难以为继。

诚然，目前的多项经济指标都不容乐观，但是这更多的是前两年宏观调控政策效力显现的必然，是中国经济主动减速的需要。2009 年之后的两年，紧缩的货币政策，房地产强力限购，“高污染、高耗能”投资项目的大面积整顿等宏观调控措施，目的都是为挤掉资产泡沫、控制恶性通胀，以调整不断畸形的经济结构。

正是基于这些政策的实施，近两年的房价结束了之前的暴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新兴战略产业开始发力，经济转型正在朝着既有的方向稳步前行。目前，GDP 增速固然在滑落，但依然维持在远高于 7.5% 的位置。财政收入、货币扩张也在回归正常化增长。只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下去，化解掉房地产泡沫、实现房价合理回归完全可期。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改变，也并非不可能。

若为了保证的短暂的 GDP 再回高位区间，而重新做大房地产泡沫，那只怕中国经济会在野蛮增长的路径上，始终找不到顺应时代潮流的方向。无论是简单的学理，还是历次宏观调控的经验总结，都告诫我们，绝不可再松绑房地产调控。

一个可以预见的事实是，在目前货币政策开始下调利率、投资项目纷纷上马的当口，若此刻放松房地产调控，那么半年之后，中国经济就立马会陷入整体过热的尴尬境地，通胀又反弹，房价再暴涨，又会倒逼宏观政策被迫进入收紧周期。如此的经济冷热快速切换，只能

让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断耗尽。

眼下在宏观政策效力显现之际，需要的是加快推进经济机制的变革，而非继续头痛医头。单就房地产政策而言，放松是最坏的选择，上策是优化政策组合，对症下药。比如过往的调控政策过于关注需求方，而塑造健康的房地产市场，更应从供给方着力。限购也并非长久之计，需要找到可行的替代方案。而非为了稳住增长，现在就一刀切式的放松。（倪金节 财经作家 新京报）

对降息拉动经济的三个预测

央行此次降息说意外也不意外！让人意外的是时间节点和降息形式。前者是因为以往降息通常在周末或者节假日后。后者是因为大家认为央行可能采取非对称降息（贷款利息下降，存款利息不变）；说不意外是因为市场对此早有预期。因为国家统计局6月9日将公布5月份经济数据，之前就有不少人预测，如果数据依旧不理想，央行必须以提前降息来提振市场信心。而5月份的数据也果然验证了这一预测。在通胀回落至近两年新低的同时，投资、消费和工业增加值也创出多年来新低。

很显然，此次降息应该属于中央稳增长政策的组合拳之一，之前推出的诸如加快项目审批、开放民间投资、汽车下乡和节能家电补贴等措施都属于这一范畴。而央行时隔三年半后再次以价格型工具取代数量型工具（调存准率），也说明经济下行压力确实巨大。关于降息的影响媒体评论很多，笔者的三个预测是：一、此次降息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有限，未来不排除连续降息的可能；二、实质上的非对称降息将意味着银行高利润时代的终结；三、房贷利率下降可能刺激新一轮刚需入市，楼市“红六月”依然可期。

首先，降息对拉动经济增长象征意义可能更大些。

有学者把此轮经济下行周期看做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延续，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从宏观上看，目前投资、消费需求之所以低迷，本质上是缘于国内严重的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和全球经济的去杠杆化（外需疲软）。在内外需下降的双重打击下，企业扩张动力很弱，这可以从PPI和新增信贷得到印证：数据显示，5月份PPI同比下降1.4%，创下了2010年12月来的新低；而信贷需求则连续几个月大幅低于市场预期。

降息的目的是通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从而刺激信贷需求增加，但从目前已开始实施的新一轮刺激政策来看，获批的投资项目仍然集中在钢铁、光伏等行业。一方面，重工业及“铁公基”项目的边际效应下降明显。此外，出于对融资平台违约风险的担心，银行会严格控制

新增贷款；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对资金成本的轻微变化并不敏感，而对一直面临融资难的中小企业来说，没降息时都贷不到款，降息后估计更悬。

其次，降息将缩小息差，使银行的利润增长更符合基本面。

央行此次在宣布降息的同时，还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 1.1 倍；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 0.8 倍。从表面上看，此次对称降息是防止银行惜贷，但由于信贷需求不足及存款大幅流失的现状，银行由于贷款需求不足导致贷款利率下降，同时又必须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来吸引存款，这使得此次降息本质上依然是非对称的（最新消息是一些城市已出现八折房贷利率，而大多数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已执行央行规定的 1.1 倍上限标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存款利率上浮和贷款利率下浮确实可以作为推进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信号。

随着经济下行带来的投资、消费愿望减弱，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的环比“双升”，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银行信贷服务对象面临转变。种种利空对八成收益来自于息差、去年利润高到不好意思透露的银行来说，意味着“高富帅”地位将受到严峻的挑战。作为先行指标，银行股罕见破净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据 Wind 数据统计，自 2011 年 7 月以来，银行股的市净率就已经在 2 倍以下，目前交通银行(4.45, -0.06, -1.33%)、华夏银行(9.21, -0.16, -1.71%)破净，现在银行股的平均市净率只有 1.16 倍。

最后，降息可能使楼市出现新一波的“刚需高潮”。

在货币政策收紧阶段，控贷惜贷的银行通过种种“潜规则”赚得盆满钵满，在实体经济普遍陷入困境的 2011 年，16 家上市银行的平均净利润同比增长高达 29.17%。在全球银行业，这也是很罕见的成绩。由于相比之下房贷收益太低，一些商业银行干脆打着调控的旗号连首套房贷都停了。而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企业信贷需求的持续低迷，房贷将再次成为各家银行竞争的优质贷款。昨天有媒体报道说，在首套房贷 8.5 折阵营扩大的基础上，八折利率最快本周将铺开，部分银行将跟风降价。在楼市调控可能局部放松的市场预期下、在种种刺激刚需入市政策的背景下，包括北京在内的不少城市都上演了“红五月”行情，在首套房贷利率下降的现实利好下，楼市“红六月”依然可期。财经评论员 张洪

（2012 年 06 月 12 日 现代快报财经评论员 张洪）

潘石屹、郭广昌“斗地主”

从去年年底开始，一场围绕上海外滩 8-1 地块 50% 权益出让的战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日前复星国际一纸诉讼，将 SOHO 中国、上海证大和绿城中国告上法庭。郭广昌、潘石屹、

戴志康和宋卫平，这些在地产界呼风唤雨多年的大佬此前甚少有交集，如今因为一个地块而齐聚上海滩，上演了一盘“斗地主”的牌局。



复星集团起诉 SOHO 等三大房企 夺地风波发生了什么

背景：上海证大于 2011 年 10 月减持了 65%的股权，以 95.7 亿元的价格将股权售海之门公司。海之门分别由证大、复星、绿城及磐石拥有 35%、50%、10%和 5%的权益。2011 年 12 月，潘石屹以 40 亿元人民币的代价从戴志康和宋卫平手中接过 8-1 地块 50%所属权。

潘石屹：生猛的谦谦君子

不想惹事又怕事的潘石屹

潘石屹曾在一则公益广告里说，他父亲告诫他“出门在外别惹事，出了事情别怕事”。在外滩 8-1 地块这张牌桌上，潘石屹把这句话演绎的淋漓尽致。

最初潘石屹并不想介入这盘牌局

这场牌局要从 2010 年 2 月说起，当时上海证大以 92.2 亿元投标得到紧邻上海黄浦江的外滩 8-1 金融地块，成为当时的地王。外滩 8-1 地块位于上海外滩豫园和十六铺世博水门之间，占地约 4.5 万平方米。未曾想随后就遇到了“史上最严厉”的地产调控政策——“新国四条”地产政策出台，复地集团、上海证大和杭州绿城都遇到了资金难题。2011 年 4 月，复地第一次找到了潘石屹，提出与 SOHO 中国共同开发，权益上复地六、SOHO 中国四。不过潘石屹很快就回绝了：“SOHO 中国从来不考虑收购低于 50%的股份。”不想惹事的潘石屹就这样让

双方的第一次接洽无疾而终。

迫于资金压力，上海证大于 2011 年 11 月以 95.7 亿元的价格将股权售上海海之门房地产管理有限公司。海之门分别由证大、复星、绿城及磐石拥有 35%、50%、10%和 5%的权益。而事实上，在 SOHO 中国进入前，证大、绿城和磐石为一致行动人，这个联合体与复星同握地王的半数股权。这也对日后牌局的走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钱和道义吸引潘石屹入局

到底又是什么让潘石屹加入了这场疯狂的牌局？尽管他自己的解释是：第一，他嗅到了金钱的味道——外滩 8-1 项目地理位置没有复制的可能；第二，帮助别人，而且一帮就是两家上市公司。但实际上，还是郭广昌想趁楼市调控刻意压价，使得戴志康和宋卫平转而投向了潘石屹。

起初，潘石屹还是非常在意已经拥有 50%股权的复星的意见的。在郭广昌只愿意收购剩余的 35%股权、而证大与绿城又明确希望打包出售股权之后，潘石屹出手了。最终，潘石屹以 40 亿元人民币的代价从戴志康和宋卫平手中接过 8-1 地块 50%所属权。

即使是交易成功之后面对复星国际的反对，潘石屹还是表示“本希望与复星好好谈”。潘石屹甚至认为是郭广昌对这事有点情绪，而这种情绪随着时间的过去也迟早会过去。如今，面对复星的诉讼，潘石屹则直接表态，声称将与另外两名被告积极应战。郭广昌曾称对“老潘”的印象拐了个弯，“本来觉得是谦谦君子，现在看来他很生猛”。

从起初的不惹事，到之后的不怕事，潘石屹就这样成为这场牌局里的庄家之一。

郭广昌：精明人在“牌局中”受挫

一向以精明的郭广昌能否扭转乾坤？

坐在“牌局”中另一边的郭广昌显得有些懊恼和愤怒。如果说外滩 8-1 地块对潘石屹来说只是一笔外地的投资而已，那对郭广昌而言则是家门口的重要项目。从郭广昌上海总部办公室的窗户往下看，就是这块地。

从渴望到收缩：精明的打算

郭广昌对外滩这块地的渴望从一开始就显露出来。回到 2010 年 2 月 1 日，外滩 8-1 项目的公开竞价现场。有 4 家企业入选——上海证大、复地、中华企业和新黄浦集团。那一天，戴志康和郭广昌双双到场。尽管复地中途落马，郭广昌仍然坚持留下来观战，一度在竞价阶段甚至坐到上海证大的席位上替戴志康举牌。

事实上，在过去的 20 年里，郭广昌都算得上是中国最精明的投资者之一。不过自从 2007 年复星国际在香港上市之后，股价就一路走软，受到调控影响，其房地产业务一直不是很顺。

所以，在外滩 8-1 地块项目出现资金问题的时候，按投资者最精明的思路，复星国际只需要维持现有控股地位，而不再继续往里大量砸钱。因此，当证大和绿城想要一起退出的时候，复星国际的回复是，它只愿意购买证大手中拥有的 35% 股权，不包括绿城。

从惊讶到法庭：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眠

SOHO 中国的突袭之举，被复星视做“跑到家门口来抢东西”。复星内部人士甚至这样描述自己的愤怒：“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别人有一天突然告诉你抢走了你的东西，你去找他谈判，他还寸步不让，有这样不讲道理的吗？”

言下之意，复星并非不让 SOHO 中国来分羹外滩 8-1 地块的商业开发，而是希望能够获得该项目的主导权。如果维持目前股权“五五开”的局面，会让之前已投入大量人力、资金资源的复星，感觉被 SOHO 中国“白捡了便宜”。

就在 SOHO 中国与上海证大、杭州绿城交易的第二天，复星国际发布公告称，对这一交易“感到惊讶”，并认为对被交易的权益拥有的优先认购权未得到保障，有可能因此“采取一切手段维权”。这种惊讶的情绪在 5 个月之后被放大到了法庭之上，复星希望让海之门的股权结构回到交易之前。

戴志康的理想和宋卫平的保命钱

“牌局”始作俑者戴志康

虽然这场牌局目前主要的庄家潘石屹和郭广昌，但两个人是无法撑起一场牌局的。上海证大 CEO 戴志康可以算是这场牌局的“始作俑者”。而浙江绿城董事长宋卫平则是另外一位好搭子，并且通过 8-1 地块的权益一度解除了资金警报。

戴志康理想破灭 宋卫平自身难保

戴志康对这个项目却几乎是一种痴迷，他曾感叹，“外滩 8-1，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理想的地块”。他想以“高山流水”为主题，将他梦想中的完美建筑搭建出来。

但意外的财务压力让戴志康的理想破灭了。自从拍下外滩 8-1 之后，有关公司破产的传言就不绝于耳，土地款就像一个紧箍咒时时压迫着这家公司，最困难时候，其账面现金仅剩 1 亿元左右。出于资金压力，戴志康无奈一再减持股份，让复星集团实现了对 8-1 地块的控股，但这仍不能改善证大的资金压力。

就在戴志康走投无路的时候，宋卫平的日子一点也不比他好过。2010 年刚过一半，绿城在账面上的资金缺口就超过 100 亿元，到 2011 年 4 月绿城的负债率更是高达 158.8%，到了 2011 年 12 月，绿城逼近了最危险的时刻，比如“银行明天要 5 个亿，但钱今天才能到账，这种情况出现过几次”。

郭广昌压价倒逼戴宋二人转投潘石屹

到了 2011 年年底，经营状况的恶化迫使证大和绿城必须加快出售外滩 8-1 相关股权的进程，而郭广昌还在压价。复星国际的回复是，它只愿意购买证大手中拥有的 35% 股权，不包括绿城。戴志康和宋卫平没有被形势冲昏头脑，打包在一起卖可能要比散卖卖出更好的价钱。在这一点上，绿城、证大，以及磐石达成了攻守联盟。要卖就一起卖。

于是，戴志康找到了潘石屹，于是这盘牌局正式凑齐了。直到此时，郭广昌仍旧压价，提出了一个令潘石屹无法接受的条件：作为失去相对大股东地位的赔偿方案，SOHO 中国在购买证大和绿城手中股份的同时必须另外支付给复星 5 亿元，除此之外，相较复星国际，SOHO 中国还须为外滩 8-1 项目额外提供 10 亿元的股东贷款。

不想惹事却也不怕事的潘石屹没有接受，2011 年 12 月 29 日，直接和证大、绿城签署了协议。在签约的同时，SOHO 中国签发了支票——证大不赔不赚，绿城倒是净赚了 1.15 亿元。而这 1.15 亿元，成了宋卫平的救命钱——绿城有一笔数亿元的账在 2011 年最后一天必须支付。

谁笑到最后：优先认购权决定

谁能拿下外滩地王还未得知

这盘牌局打到现在，胜负手就在复星国际是否具有优先认购权上面。

复星国际表示，自己在该股权转让中拥有优先认购权，无需与 SOHO 中国分享。SOHO 中国则披露称，是在复星国际和上海证大、绿城中国商讨购买 8-1 项目 50% 的权益无果，且出价比自己低的情况下，证大地产及绿城中国才最终选择和 SOHO 中国成交。此后，绿城中国和上海证大方面表示，上述将股权出售给 SOHO 中国的协议，并没有侵害复星国际的优先收购权。

优先认购权 VS 间接受购

值得注意的是，通常说的优先收购权是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公司股权时才发生的，SOHO 中国在声明中表示并非收购地块项目公司海之门公司的股权，而是收购该外滩 8-1 地块项目 50% 的权益，这是一个间接受购，避开了公司法中股东优先收购权的规定。这个层面上的收购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难以找到明确的适用规定。

结语：外滩 8-1 地块的走向何去何从，我们还不得而知。而在楼市调控的大背景下，几大地产巨头争抢地王地块，多位地产大佬从口水仗打到对簿公堂，值得我们持续关注。（腾讯财经 6 月 12 日）

政府是有限的

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思考性基础：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政府都是有限的。制度意义上，有限政府甚至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最伟大的成果之一。遗憾的是，由于每个人自私的先验性逻辑起点存在，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也堕入了自私的深渊。由此，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限政府的价值之后，依然有一小部分人不喜欢甚至拒绝这样的制度设计。

历史是触目惊心的。人们将永远记住喧闹的 20 世纪，卑斯麦和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政府，一度无边界膨胀，几乎要管住每个人的呼吸；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不仅把所有的土地，所有的公司都收纳其中，甚至连脑袋里面的思考也控制起来，谁不顺从斯大林思考的方向，谁的脑袋就会秘密消失；中国当然也不是例外，政府无限膨胀，以至于每个人的粮食都被定量，布匹和糖也需要计划，当政府派发的粮食不再抵达，有高达 3000 多万的人竟然被饿死了。

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的历史悲剧更加让人难过？当我们陈述这样的罪恶，很容易让别人误以为我们不过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反政府主义者。这是需要反复说明的地方：倡导一种有限政府的秩序，并不意味着政府不重要。我们警惕的是，政府借用强制性的、过于集中的权力，破坏市场的秩序，甚至侵犯人们的私权利。事实上，无论在何种制度背景下，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这么做。几乎每个政府都是这样的，对历史的教训故意视而不见，人为设计很多制度性的漏洞，让政府的政策不受制约。道理由此变得非常简单，一个单个的自然人，因为没有借助公权力，他或她对别人，对市场的伤害性，都是小范围的，甚至是无足挂齿的，但是如果拥有公权力的政府理直气壮地这么做，市场的灾难或者是人道主义的灾难，就会很快来临。

所以我们呼吁一种有限的政府秩序，政府的任何一种权力都是每个人授予的，其目的是让政府保护每个人的私权利，保护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市场体系中的权利。私权利成为政府行事的最后边界，要想尽一切办法，控制政府的无边界发展，绝对不能让政府强大到摧毁或者忽略每个人的私权利的程度。

问题指向两个方面。

其一，有限政府的建立，目的当然是约束政府的滥权，这反过来意味着，有限政府的建立，也是为了约束每个人的原罪。人类社会的局面就是如此，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那么政

府就不需要建立，问题在于，没有一个人是天使，每个人都有罪，因此政府的设立呼之欲出。洛克的《政府论》就是在这样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陈述。周全的思维方式是，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每个人的原罪，而政府是所有选项中相对比较有效的约束每个人原罪的组织形式。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让一个由人组成的政府越过最高原则，来伤害每个人，政府不能无限膨胀，以至于可以借助政府的名义，伤害每个人，必须把政府限制在一定的权力范围之内。所以洛克强调，政府和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者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每个人的自由。一个有限的政府，应该对每一个人的权利加以重视，这样的权利，包括了一个人在法律的约束下随心所欲处理和安排自己的人身、行动、财富和言论的自由，在这个范围之内，一个人不受另一个人的支配，尤其是不能受政府的支配。一个有限的政府，应该从这样的私权利领域退出去，彻底地退出去。

其二，如果有限政府只是一种凭空想象出来的理念，而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试错的结果，那些热爱大政府的人们，就有了拒绝有限政府的坚实理由。所以，对历史的了解与分析，就成为重要的功课。“历史告诉我们，团体和个人都非常容易受到暴政的诱惑”，这是托马斯杰弗逊 1774 年说过的话。这里的暴政，就是大政府主义。既包括了由大政府推动的计划经济形态，也包括了绝对惟一性的政府意识形态宣传，还包括对一个明星政治偶像人物的非理性膜拜。当三者结合在一起，大政府主义就成为一种强大的生活方式，暴政来了，灾难来了，所有人都张开怀抱，为自己能够遭遇灾难欢欣鼓舞。

任何一种大政府主义的实现，一定是魔鬼暴君与普罗大众合谋的结果。有人在《圣经》和亚里斯多德的学说里找到了反对大政府主义的历史性理由。当摩西上西奈山领受十诫时，以色列人制造了一尊偶像。这是亚伦的杰作，那些在路上的犹太人，当时当地的态度，不是抵抗亚伦，反而是欢呼，是积极参与。这是最古老的错误，背后的逻辑是，亚伦将人的组织的行为的边界打破，直接违反了神的最高原则，人不能拜偶像。但是亚伦的行为，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却最具有蛊惑性，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取悦神，而是取悦以色列人。这就意味着，亚伦的“政府”，破坏了最高的原则，因此不再是一个有边界的政府，而是一个无限的大政府，无限到抗拒神的诫命。

政府因为夹带公共利益，使得人们丢失掉最高的敬畏原则，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亚里斯多德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的自然观念，就是从理性思考路径出发，将自然的秩序置于神的高度。这启发了后来的有限政府理念，任何一个政府的行为，都必须以最高的自然秩序作为起点。这是自然法的起源。政府或者说政府制定的法律，不仅是政府意志和权力的表现，

必须要建立在至高无上的原则之下。政府和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管辖，没有人高于法律。而法律的位置，毫无疑问，是不可高于神，不可高于自然秩序。

感谢先知们的努力。他们提醒我们，任何由人组成的政府，必须有所敬畏，必须建立其必要的和合适的列举型权力。也就是说，政府一定不是无所不在的，政府和一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惠的关系。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以契约的形式写进宪法，人有赋予政府公权力的权利，也有抵抗政府滥用公权力的权利。个人的”抵抗权”由此建立，这才是有限政府的基石。

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抵抗权”的存在，人们才得以在大政府主义的历史漩涡里，一直顽强地守卫自由。荷兰、英国和美国，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的历史证明，有限政府的建立是有可能的，而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也是有可能的。这是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传统：没有政府和官僚的干预，繁荣就有可能；没有政府强制参与的宗教秩序，社会的稳定和每个人心灵的自由，就有可能；没有不受限制的政府的绝对统治，就有了建构法律体系，建构有限政府的可能。而一旦有限政府成为现实，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形成了一个可以期待的制度基础和信仰基础。（苏小和新世纪杂志 2012 年第 22 期）

司局级干部的“世界观”



清华大学吴大辉教授讲授中俄关系。习惯对部下“作指示”的司局长们，上课时对提问并不积极，更喜欢以匿名的方式给老师递纸条。（赵晓悦/图）

一个干部学员问：“假如中国强大起来，甚至超过美国若干倍，钓鱼岛问题能迎刃而解吗？”刘江永说：“日本不是这样的，它弱的时候反而更强势。你看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它并没有比俄国、美国强，但敢抢。”

在近来发生的中菲黄岩岛对峙问题上，一个学员觉得中方还是太软弱，“中国总以大国自居，什么都要让，国际上是无序的，谁拳头硬谁说话”。

“以世界第二的地位看，‘韬光养晦’已经维护不了中国的利益了。”面对台下听课的司局级官员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阎学通直言不讳。

2012年4月16日上午，148名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走进清华大学，参加“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对外大战略”课程班的第一堂课。久坐于办公桌前的司局长们，利用一连五天时间，进课堂、吃食堂，在清华园里再次体验了一回大学生的滋味。

在总共40学时的课程里，既有培养领导干部大局观的“国际战略格局”，也有系统介绍中国外交政策、国防政策的专题课，还有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国别问题研究。具体承办课程班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教授说：“缺的是发展中国家，比如金砖国家里的巴西、印度、南非，但我们会在介绍中国外交政策时弥补。”

该如何看待当今的世界？授课老师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在提及中美关系、朝核问题、南海争端时，老师们把各种想法都一股脑抛了出来。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司局长们，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他们的“世界观”又是怎么样？

“绝不允许大国欺辱，也不允许小国调戏”

第一堂课由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阎学通讲授国际形势，他向来以言辞大胆犀利著称。4月16日早上9时，在正式上课前，阎学通先给司局长们有言在先：机关里大家的观点差不多，在学校里很难做到，今天我讲的就不是“正统”观点。

他自问自答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拜金主义’。”在他看来，“拜金主义”思想已经遍布全中国，在世界上是没有吸引力的，“外交政策不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正是因为“拜金主义”横行，中国人对于美国的理解就会有偏差，想当然地以为“钱一定是美国的行为动力”。有一次，一个美国人问阎学通，“中国人总觉得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石油，你们有没有看过伊拉克2011年出口石油的统计报表，伊拉克对美国出口才百分之十几？”

给司局长上课的老师，大多数都有在美国留学或者工作的经历。阎学通对美国的认识是，“美国之所以是负责任的大国，就在于美国政府只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负责，奥巴马就曾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说过，不会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向任何人道歉”。

在许多问题上，老师们的观点很难完全一致。比如，讲授经济外交的何茂春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不是好词，中国已经告别发展中国家了”。楚树龙教授却坚持认为“从经济属性上看，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楚树龙也承认，自己的观点比较接近政府，因为“觉得政府想得更有道理”。

讲到中国如何应对朝核、南海以及周边安全等诸多棘手问题时，孙哲教授认为依然需要“韬光养晦”，他解释为：韬意识形态之光，养经济建设之晦，有秩序建设之为。阎学通却不这么看，“正确的外交战略就是不断调整的战略”。他拿朝鲜问题做例子，“你必须想清楚怎么跟他打交道”。中国也要适时改变“不结盟”的政策，牢牢巩固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在他看来，正因为中俄共同搞了上海合作组织，才让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安全环境大大优于东部和南部，“外交政策一定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不是从感情出发，也不是从好恶出发”。

国防大学杨毅的思维方式更符合他海军少将的身份：敢于让侵犯中国利益的国家吃苦头，帮我们的国家有甜头，“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允许大国欺辱，也不允许小国调戏”。

按照中组部要求，每堂课后，司局长们都要填写一个“课程教学质量评估表”，为授课老师的教学水平、内容、方法、效果等项目打分。一个司局级干部在阎学通讲完后，给教学态度、语言表达都打了10分，打8分的包括“对推动工作帮助程度”等等。最后一项——对个人成长帮助程度方面，他打了一个“10分”。

“大国关系怎么能和谐呢”

4月19日上午，刘江永教授讲完中日关系课后，三四位学员不肯走，围住他继续讨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一位学员说，“中国老百姓爱国，但对钓鱼岛问题、东海问题，说不清历史渊源，光说这儿是我的，可为什么是我的，肚子里没货”。他抱怨，“中国的普及性资料还是太少”。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蓝野也直接向老师提意见，“钓鱼岛划界问题分歧特别大，这个要害您还没有讲出来”。

“没时间讲了。”刘江永觉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则就有问题，“为什么现在对钓鱼岛、黄岩岛争得这么厉害，因为海洋法公约规定，大陆延伸的200海里是专属经济区，但从岛出去就有争议了，直径就变成400海里了”。

课程班开课时，虽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陈旭在致辞中特别提出：“希望大家把实践中的思考，跟老师进行交流”，但从实际上课情况看，习惯对部下“作指示”的司局长们，更喜欢以匿名的方式给老师递纸条。

阎学通收到的第一张纸条是有人问：中美能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吗？阎学通喝了一口水说，中国官方定义的大国关系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谐友好的关系，“但是，大国关系怎么能和谐呢？”他说。

正常情况下，只要老师要求司局长们递纸条，每堂课总会有七八个问题。只有一次，国防大学少将杨毅讲授中国国防外交时，在他一再鼓动下，学生们终于站起来提问了。

“南海问题上海军为什么不出面？”

“不是海军的问题，是国家统一协调问题。”杨毅说，“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但中国被逼到墙角时，海军决不能无所作为。”

之后，司局长们出人意料地表现出对军事的浓厚兴趣，包括“气象战有无先例”、“美国空天一体战到了何种程度”、“中国军费投入多少才算合适”等问题，都在课堂上抛给了海军少将。

司局级干部们的自助午餐安排在学生食堂闻馨园，从上课地点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刘卿楼）一楼报告厅步行过去，至少要走 15 分钟。按照孙哲教授的说法，规格相当于清华大学的硕博研究生，“走路去吃饭，也算体验校园生活”。

每天早上签到后，负责课程班服务的清华学生就把当天的自助餐卷交给学员。闻馨园除了接待司局长就餐外，普通清华学生也可以进去，45 元一位。一般情况下，中午 12 点课程结束，授课老师自行离去，但讲完中日关系时，刘江永跟司局长们共进午餐，话题也依然离不开上课的内容。

一个正准备打菜的学员插了一句：“假如中国强大起来，甚至超过美国若干倍，钓鱼岛问题能迎刃而解吗？”刘江永接过盛饭的勺子说：“日本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在弱的时候更强势。你看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它并没有比俄国、美国强，但敢抢。”

在日常工作中，司局级干部接触的各种信息多，对于国际问题也有自己的认识。在交通运输部干部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卫民看来，美国最早跟中国好，是想和平演变中国，“美国这些年因为搞反恐没腾出手来，现在这些问题平息了，美国就有时间有力量来治你了”。

在近来发生的中菲黄岩岛对峙问题上，一个学员觉得政府可以更强硬，“中国总以大国自居，什么都要让，阎学通老师讲得好，国际上谁拳头硬谁说话”。

“司局级大学生”挺有主见

按照中组部的要求，2012 年是开展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选学的第三年。司局级干部的选学课程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一年要满 110 小时。必修课由中央党校开设，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发展”、“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等四门课程。选修课则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7 所院校承办，内容涵盖宏观经济、金融财政、社会管理、文化建设和舆情引导等方面内容。

2012 年年初，清华大学文科处打电话给孙哲，问他的中美关系研究中心愿不愿意给司局长办个“国际问题”选学班，孙哲觉得有意义，便着手准备，最后报名学习的司局长达到了 148 人，不过孙哲承认，“在清华大学过去承办的各类学习班里，最火爆的还是美院搞的美术欣赏班”。

很多司局长报名是因为业务需要，像商务部美大司副司长、外交部参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想法都很相似，都想通过上课“形成一个大的国际战略框架”。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纪斌每天花三五个小时在上课的路途上，有时候下课后还要赶回办公室处理公务，但他坦陈“上学时都没有这么大的动力”。家住通州的交通运输部干部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卫民，每天早上 6 点就爬起来出门上课。他感觉来听课的司局长们都觉得“中国在软实力、国内问题上必须要改善，否则真的很让人担心”。

在许多问题上，司局级干部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老师。关于孙哲教授提出的“降低军费增速，增加教育投入”的观点，刘卫民就不同意，“这种分析缺乏战略性，太实际了”。刘卫民支持杨毅将军的观点，“要增加中国军费开支，你只有不怕美国，别人才会怕你”。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可金上课时，一位学员请他对中国外交工作做一个整体性评价。赵可金说，“美国有六万人搞外交，中国只有六千人做外交，做到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上述学员却不同意，觉得外交部工作做得还不够好。2010 年他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有几百人排队，但卫生间只有一个座便器。“美国在这方面讲人道吗？外交部也不去交涉一下。”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蓝野虽然对阎学通的课评价不错，但他不赞同阎学通对于“拜金主义”的看法，“全世界的利益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利益，什么友好都是假的。你看尼克松来中国，下飞机第一句话是‘我是代表美国的利益来的’，啥叫利益，利益是实实在在的”。

不过，刘卫民却认为“中国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中国人掉在钱眼里了，没有比 GDP 更重要的东西了”。刘卫民认为，中国要创新一种制度，把我们的文明发扬光大，对世界真正成为一个榜样，而不仅仅是经济崛起。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讲中国经济外交时，课堂气氛最热烈。“9·11”发生后，何茂春觉得美国肯定会发生金融危机，他的理解完全出于经济学角度：美军一个士兵一年消耗上百万美元；美军一套行头 75 万美元；死一个士兵，美国政府要赔 100 万美元。“战争让美国把有限的财政盈余打亏了，之后美国肯定要刺激经济发展，它就会制造泡沫，容易产生危机。”

茶歇时，一个学员跑到讲台对他说：“您讲得太精彩了，让我们感到振奋。”何茂春在商务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还向他发出邀请：“什么时候回去给我们讲讲啊！”何茂春则打趣道：把我调回去呗！（南方周末 刘斌 特约撰稿 赵晓悦）

● 国是论衡

论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

一、引言

在脱离学术界 20 多年之后，自去年年底，陆续参加了一些关于改革问题的学术研讨，看到了人们对于中国未来走向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似乎又回到了 1980 年代中后期人们对于改革的热盼之中。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即使社会氛围还不够宽松，但忧国忧民者依然众多，思想照旧活跃。甚至可以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定范围开始出现。在物欲横流的商业大潮下，大批有识之士仍然保持着执着的追求，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现象。二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社会问题的严重，历史上积累尚未解决的问题和近年来产生的新问题相互交织，社会矛盾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今天，中国将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路口。不过，如果说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的话，那么未可乐观的是，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上却是分化严重以至尖锐对立。

与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前的情况比较，今天的中国和 20 多年前已经绝非可同日而语，可谓天翻地覆。不仅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学术界后辈崛起，更重要的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分野。当年的学术界对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歧，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是拥护和支持的，分歧仅仅在于步子的大小、节奏的快慢、程序的先后和路径的偏差等。而今天的思想界，马立诚先生划分为八个流派，计有：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等。[1]李伟东先生则归纳为十种思潮或六种思潮[2]。诸多思想流派间，对于要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尖锐对立。有人甚至把社会自我完善、改良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等同于西方化自由化，把它说成是具有阶级属性的。仅就这点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倒退。这和多年来未能很好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有关，也和搁置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有关。

今天，在人们感到有必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时，却发现寻找路径时找不到共识了。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认识上，有学者则总结计有：以房地产市场改革为突破口、以土地改革为突破口、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突破口、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突破口、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公众参与为突破口、以铲除垄断行业为突破口、以人事制度为突破口、以建立公民社会为突破口、以宪政改革为突破口等多种诉求。应当说这一总结还并不完全，至少还包括以基层选举、以法制改革为突破口等等。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上更是百家争鸣。从竞选、普选、多党制、三权分立、两院制到言论自由、舆论自由、结社自由，还有党内民主、党内分派等，甚至也有文革式大民主等观点，不一而足。

如果不能把这些社会的思想异见梳理清楚，建立共识，是难以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求得社会最广泛的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注定无法启动，即使启动了也会再次夭折。

二、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首先，笔者认为，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今天再度谈起政治体制改革，分析一下那次改革的经验教训，实为必要。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可以说，改革开放就是在文革极端条件下，逼迫人们进行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是文革中首先在两个群体中展开的，一是以文革中收到打击摧残的老干部群体，一是具有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经历的第三代青年。[4]但是这两代人的反思有一个重大差别，即第一代往往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中求解中国的方程式；第三代人甚至在文革中就开始了全方位的探索。这两批人的结合，形成了最早推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锋。

邓小平、陈云等为首的一批老一代对专制制度弊病的反思、在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率先提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5]痛定思痛之后，他们开始寻求限制专权、建立防止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的国家机制。同时鉴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迅猛发展，需要在政治制度层面上适应和保障。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第一次在国家制度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了。

这次改革首先在社会上进行了较充分的舆论准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理论务虚会、反对“两个凡是”为代表，民间则出现了“民主墙”及很多论坛、刊物，各种思想、观点如雨后春笋般萌发出来，曾有过一段打破思想禁区的热烈气氛。这一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各种小的波折，但总体上还是一个健康的思想氛围。党内上下、体制内外共识性很强，试图遏制改革的保守力量几乎没有市场。邓小平亲自掌舵，由尚未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出马担纲，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了。

经过一年的研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属七个专题研讨组分别提出了课题报告，由当时的办公室[6]吴国光等人整理起草了十三大报告中的分报告——中共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

今天看来，这个报告是一次夭折的改革的历史记录。为何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报告非常之空洞，题目很大，吊起了人们的胃口和过高的期待值，但却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它最后的落脚点，放在了实质上并不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党政分开”上面。中国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沦为了一次行政体制改革。

三、对这次改革失败的几点分析

关于中国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很多人认为是由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流于肤浅。严格地说，即使没有什么风波，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注定也要失败。这是因为：

一是它并没有触动原有国家层面的政治制度。

这里需要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予以定义。笔者认为，必须是涉及国体和政体的改革，即对国家层面政治制度的改革，才能称之为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应当区分开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执政党体制改革的内容，因为它们追求的目的和功能是不同的，互相间是不可替代的。不应混为一谈。现在还有关于“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说法，笔者认为这些提法要么内涵不清，要么是二级概念，这里不做论述。本文也遵循这一思路进行论述。

在这个意义上，以党政分开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无论如何不能称其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改革不仅不能对权力进行制约，反而使已经十分臃肿的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一套班子成了两套班子。党、政在中国现实中不仅分不开，还增加了内斗。另一方面，更多的位置使更多的干部得到升迁和安排，成为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而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见到实质性的改革成果，反而大幅度增加了对社会管理成本的负担。即使党政分开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走了样，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党企的关系却更加紧密。这又是一个悖论。

略有一点新意的是，十三大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正式作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三大后的次年，中共中央又成立了中央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的研讨小组，笔者也有幸参与其中。这次研讨的最终结果，是建立起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座谈会制度。但是，它依然没有触动原有国家层面的政治制度，而且缺乏程序上的设定。结果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这种座谈会实质成为了一种通报性质的不定期会议。对改善国家政治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是它没有达到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期。

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初衷，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这是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但是，这次改革不仅没有解决“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的制度保障，甚至没有建立经济起飞中防治腐败的制度保障。恰恰由于这一点，成为而后发生大规模社会动乱的制度上和体制上的根源之一，也是导致今天发生全面的、渗透至基层的体制性腐败的主要根源。以至于文化大革命结束 30 多年后，人们依然在担忧二次文革的出现。

三是它没有满足中国社会改革的基本要求。

在政治权力和商品市场密不可分中国特色下，当时制约权力和对遏制腐败的社会要求已经极为强烈了。人们在总结 1989 年政治风波的教训时可以看到，正是由于曾对此次改革寄予厚望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阶层深感失望后，社会情绪开始躁动。当时社会的情绪集中在所谓反“官倒”上，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希望执政党能够痛下决心从制度上加以遏止。青年学生是社会最敏感的群体，十三大刚刚结束一年多，他们就已经按捺不住而上街了。反过来认识问题，它也说明这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已然失败。人民看不到任何有效的国家民主体制上的改善、看不到对腐败的制衡和监督，甚至看不到一个被承诺的具体措施及其时间表，而是一些无关痛痒的空话。

四是这次改革的最高领导层缺乏明确的目的和改革的决心魄力。

当时负责领导这次改革的中央领导小组，从一开始就没有充分重视这次改革，大有把这次改革作为完成老一辈革命家交办任务似地对待。他们没有看到，当年社会、党内的改革共识实际上是千载难逢的，悲观地说，此后几乎再难有这样的历史机遇了。但是，领导层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过多地看到困难、阻力和不利因素，迁就于保守的、惰性的力量。他们的主体思路仍然希望遵循先经济、后政治的优先次序，最终让人民失望了。[7]甚至他们自身也成为其受害者。因为，把这次改革的失败说成是未久发生的政治风波的导因之一，并不为过。

五是各方面在改革突破口的选择上诉求很不一致。

从一开始，人们对这次改革的总体诉求上可以说共识很强，但是在如何选择突破口上面，又可以说上下不一致，体制内外不一致，甚至体制内各门派之间也不一致。所有的改革派们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也就无法找到一个执政高层能够接受的、又可以满足广大人民民主要求的、同时还能够解决中国社会迫切现实问题的突破口。于是，在各说各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报告，基本上就是各方主张拼凑出来的，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有政治生命力？当然，有人会说关于政改主要解决党政分开的提法来自于邓小平，这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邓小平而言，当时并非没有接受其它突破口的可能。

六是这次改革的启动时机并不合适。

1987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闯物价关”的前夕，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任何重大政治措施的出台，最佳时机显然是经济的上行期。但是这次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是在一个稳定的上行期，而是在一个困难重重的门槛前提出的。且不谈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感受，就是从这次改革领导人的精力看，势必会更多地关注经济领域的问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五人领导小组参与和听取各研讨组的汇报，次数极为有限，领导人的指示和插话往往流于漫谈。字里行间、话里话外，笔者很难相信他们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的认识和研究。有人提出，1987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启动的一次错误的改革。这一说法，不能说毫无道理可言。

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我们不能不说，当年主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高领导层，积极参与其中的体制内外的改革者，以至于整个的思想界、知识界由于缺乏共识，导致关注的焦点分散，而酿就了重大的历史错误。于是，中国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的无疾而终成为必然。

这里所谓缺乏共识，当然不是指缺乏对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共识，而是缺乏对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共识，首先表现在无法选择正确的突破口上。于是造成我们今天的扼腕叹息，在一个得之非易的机遇中，中国社会没有出现制度上的改良，而走上了恶性循环的道路。以至于当年体制内还能支持改革的部分保守力量，之后也干脆摒弃了政治体制改革。更为极端的一些人，如前所述，更把社会自我完善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冠以意识形态色彩！另外，它的失败也给后来的领导者制造了障碍，而自我设立起樊篱，成为不作为的充足理由。

就当年改革派们所犯的错误的而言，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应当记取：一是继续着中国传统政治的“政见之争、宛若仇讎”，缺乏现代政治中的妥协意识；二是不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着手于社会迫切需要的实际问题，而往往从概念出发、从体系出发、从终极价值出发探讨问题；三是诉求分散，不能形成强有力的聚焦点和有效的压强。这些问题是我们今天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中，不能不考虑也依然无法回避的。（米鹤都：炎黄春秋 2012 年第 6 期）

●悦读时光

习仲勋逝世十周年 是如何直言反“左”的

摘要：当“左”倾大潮在土改运动中开始蔓延时，习仲勋再次“不同凡响”：对风靡一时的康生晋绥土改“经验”，明确提出异议和批评；在党的会议上，反复申说自己对老区土改的看法；一个月时间内，三次上书毛泽东，直言反“左”。



《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出版

5 月 24 日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逝世 10 周年纪念日。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工作，率先提出在广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2008 年，《习仲勋传》编委会编，党史专家、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贾巨川先生独立执笔撰写的《习仲勋传》（上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全面、翔实、生动地再现了习仲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牢记“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革命经历，向读者展现了一位深受人民群众拥戴的“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的光辉形象。

作为党史专家，贾巨川对习仲勋同志的革命经历十分了解。2002 年习仲勋同志逝世时，新华社播发的四千言的《习仲勋同志生平》，也出自贾巨川手笔。近日本报记者经过多方联系，于 5 月 20 日一早连线刚从外地回到西安的贾巨川，在长达两个小时的通话中，听他详细介绍了《习仲勋传》（上卷）的写作过程。在撰写的五年中，贾巨川每年在深圳习老夫妇身边生活大半年，不仅对习老的革命生涯经历有了第一手的真实材料，更对习老的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爱护群众的高尚道德品格有了真实认识。“幸运的是，习老生前亲自审阅了约 20 万字的书稿，并给出‘原则同意’的书面答复；遗憾的是，没能看到书正式问世，老人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习仲勋同志的革命征程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严峻考验中行进、成长、创造、奉献，成为深受人民群众拥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人生经历充满波折和艰辛。能够担当《习仲勋传》

的执笔撰写任务，贾巨川说他感到责任重大，同时也倍感幸运。他最早介入传记的写作要追溯到 1996 年秋季，“当时习老还健在，中央有关方面批准同意编写习仲勋系列丛书，《习仲勋传》是三本丛书中的一本，算是压轴之作。”贾巨川介绍，当时自己已经从部队转业 8 年，担任陕西渭南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在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纪念建党 75 年时贾巨川被评为全国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受到了胡锦涛、尉健行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或许正因为这个机缘，他得到上级的重视和信任，被调到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当时组织了一个七八个人的写作班子，分头执笔，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在历时五年的写作过程中，贾巨川查阅、参考、使用了充分有力的史料证据，这些读者可以从该书中的大量注释直观地看到。同时，他走访了 150 余名与习仲勋一起工作、战斗、生活过的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亲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使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因此，该书称得上是一本严谨的史学著作。

毛泽东对习仲勋有过很高的、中肯的评价是确定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习仲勋曾有过多次高度评价，其中一些话不乏传奇色彩。通常人们比较熟悉的有“毛泽东当面称赞‘你比诸葛亮还厉害’”、“毛泽东第一次见习仲勋就赞其为‘娃娃主席’”等等，还有人写文章的题目就是“让毛主席无比敬佩的习仲勋”。贾巨川说，作为历史工作者，首先应该具有优秀的史德，景仰历史更应敬畏历史，传记作者的笔下，应当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把一个可经历史检验、可资世人评说、可使传主安息的人和事告诉读者。“即使是为一个人著书立传，也决不能把传主推上神坛，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应超越一定的历史背景、时代趋势、认识局限。”

他表示，毛泽东对习仲勋有过很高的、中肯的评价是确定的。他亲笔为习仲勋写过“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但其他的话有没有演绎的成分？这需要我们加以辨析。“‘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以及‘娃娃主席’的话，毛泽东说过没有？我没有看到过相关的文献资料。习老自己曾发表过回忆毛泽东的文章，在详尽文字记述中也没有这样的话。他回忆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 1935 年 12 月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听报告，当时两个人距离很远；而二人第一次长时间谈话，已经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因此这些话就值得商榷，不可人云亦云。假如主席曾经说过，那么习老自己应该记得最清楚，也会写在自己的文章中。”

而至于“让毛主席无比敬佩的习仲勋”的提法，就有些离谱了。在毛泽东面前习仲勋是学生，是晚辈，是领袖与地方干部的关系。而且以毛泽东的气质，让他“无比敬佩”一个比自己小 20 岁的下级也不太可能。

贾巨川说，历史的真实要靠语言的平实来体现，没有见诸于历史文献的、没有亲自查阅考证的资料，都不应予采信。人常说史书的生命在于真实，写史就不能拿“生命”当儿戏。

“我的资料和事实依据，主要选自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陕西省及甘、宁、青、新等省(区)档案馆保存的习仲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稿、书信、电报、讲话记录等，也包括发表在书籍、报纸杂志以及内部印刷品上的各类消息、通讯、图片和言论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出版的《习仲勋文选》、《习仲勋革命生涯》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也为资料的核实、选用提供了相应佐证。”

《习仲勋传》五大看点

《习仲勋传》(上卷)从1913年习仲勋出生写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跨度长达36年。反映了习仲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陕甘边区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的革命经历和贡献。作为关于习仲勋同志的第一本全面翔实的传记，该书面世后，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广泛关注，更在专家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李东朗曾为该书总结了五大看点：

一是习仲勋在陈家坡会议上是如何表态的？

习仲勋21岁就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危难时刻的正确决断，显示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一个典型的、颇能反映习仲勋领导才华的事例就是1933年8月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在讨论决定以后革命方针的陈家坡会议上，两种对立的意见“争论得十分激烈”，会议“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时才结束”。而作为会议执行主席之一的习仲勋的意见，对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结果，至关重要。在刘志丹等红26军主要领导人身陷终南山未归的情况下，面对资历较自己老的同志的不同意见，习仲勋旗帜鲜明的主张，显示了他高瞻远瞩的洞察能力和卓越的领导才华，对会议形成正确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习仲勋是如何面对错误肃反的？

1935年9月下旬开始，西北革命根据地发生错误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错杀200多人，造成西北革命的严重危机。习仲勋罹祸其中。肃反主持者准备活埋被监禁的同志，甚至土坑都已经挖好。庆幸的是这时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制止和纠正了错误的肃反，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100多位被关押的同志，挽救了西北的党组织和西北革命。但是，由于当时形势和条件的限制，肃反主持人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习仲勋遭遇了不公正，但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些安排，在很困难的形势下坚持关中游击战争，开辟

红军西征新区，工作卓有成效。危难时刻见精神，习仲勋在这次肃反中及其以后的表现，充分彰显了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党性和崇高风范。

三是被错误肃反的习仲勋是如何获救的？

长期流行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到达陕北吴起镇，了解到刘志丹等被逮捕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这个说法有误。首先，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刘志丹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其次，直至几近一个月后，在了解更多情况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没有完全否定这个“肃反”。第三，关于派王首道等前去制止错误肃反的地点和时间，不是在刚刚长征到达吴起镇之时，而是在11月初中共中央到达甘泉下寺湾后。其时，在听取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领导人汇报，更多了解肃反情况后，毛泽东、张闻天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

四是习仲勋是如何反对康生，直言反“左”的？

当“左”倾大潮在土改运动中开始蔓延时，习仲勋再次“不同凡响”：对风靡一时的康生晋绥土改“经验”，明确提出异议和批评；在党的会议上，反复申说自己对老区土改的看法；一个月时间内，三次上书毛泽东，直言反“左”。在“左”倾大潮汹涌并且颇有来头之时，敢于倡言反对，需要大智大勇，需要负责、奉献精神。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毛泽东非常重视习仲勋的这些实事求是的意见，两次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

五是毛泽东为什么赞誉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在中国革命史上，革命的发动和人民对革命的拥护和参加，是经过共产党人大量艰苦、细致工作的结果。习仲勋就是这样一位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也正因如此，毛泽东赞誉习仲勋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贾巨川表示，从党史研究的角度，从西北革命斗争史角度总结传记的内容，这五大看点十分准确，基本概括了习仲勋前半段革命生涯的主要经历和重大转折。同时他也说，自己的写作出发点是写一个客观而真实的人，在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朴实清新的写作风格、精雕细刻的文字锻造，使历史人物走出历史，进入现实生活，使习仲勋的生平、事迹，特别是他的理想追求、精神风貌和鲜明个性跃然纸上。读罢掩卷深思，读者可以感受到习仲勋同志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对国家人民的深厚感情、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以及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2012-05-24 济南日报）